



天祿琳琅知見書錄

劉薈

著

北京大學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天祥琳琅知見書錄



劉薈

著



北京大學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天祿琳琅知見書錄 / 劉薔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學出版社, 2017. 4

ISBN 978-7-301-28184-0

I. ①天… II. ①劉… III. ①藏書樓—圖書目錄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Z842.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7) 第 051192 號

本書得到北京市社會科學理論著作出版基金資助

- | | |
|-------|--|
| 書名 | 天祿琳琅知見書錄
TIANLU LINLANG ZHIJIAN SHULU |
| 著作責任者 | 劉 薔 著 |
| 封扉題字 | 劉 石 |
| 責任編輯 | 王長民 沈瑩瑩 |
| 標準書號 | ISBN 978-7-301-28184-0 |
| 出版發行 | 北京大學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|
| 網 址 | 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學出版社 |
| 電子信箱 | dianjiwenhua@163.com |
| 電 話 |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|
| 印 刷 者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|
| 經 銷 者 | 新華書店 |
| | 650 毫米 × 980 毫米 16 開本 56.25 印張 924 千字 彩插 1 |
| |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價 | 160.00 元 |

未經許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。

版權所有, 侵權必究

舉報電話: 010-62752024 電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 請與出版部聯繫, 電話: 010-62756370



作者簡介

劉 嵩

文學博士，清華大學圖書館研究員。主要學術興趣在版本學、目錄學及藏書學。出版有《清華園裏讀舊書》(專著)、《天祿琳琅研究》(專著)、《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》(重訂主編)、《窳穢日記 鷗堂日記抄》(點校整理)等。主持完成多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和全國高校古籍整理項目等，發表學術論文八十餘篇。

沈津序

今年八月，我在美國休假，劉薈在電話中告訴我，她的《天祿琳琅知見書錄》（以下簡稱《知見書錄》）即將定稿，八年的辛苦勞作，終於要見曙光了。此說令我為她高興。九月中旬，當我回到中山大學，即在辦公室見到了一厚本的《知見書錄》，抽暇翻閱之後，就感覺到這不是一本泛泛之作，而是含金量頗高的學術著作。

天祿又稱“天鹿”，是古代傳說中的神獸，後多雕刻成形以避邪，謂能祓除不祥，永綏百祿。琳琅者，美玉也，是玉石中最精品、最上乘的一種。“天祿琳琅”，是清朝乾隆帝的藏書精華，也是仍存於世的清代皇室藏書。清乾隆九年（1744）開始在乾清宮昭仁殿列架藏置宋元等善本書，題室名為“天祿琳琅”，意謂內府藏書琳琅滿目。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，大臣于敏中、王際華、彭元瑞等十人受命整理入藏昭仁殿的善本書籍，“詳其年代槧印、流傳藏弃、鑑賞採擇之由”，編成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》。書目共十卷，按宋、金、影宋、元、明本時間先後為序，版本時代相同，再按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排序，計有宋版 71 部，金版 1 部，影宋抄本 20 部，元版 86 部，明版 251 部，總共著錄善本書 429 部。

嘉慶二年（1797），昭仁殿所藏典籍因祝融而全部焚燬，當時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帝詔令重建昭仁殿並蒐集藏書，彭元瑞受命仿前編體例，編成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二十卷，收錄宋、遼、金、元、明五朝善本 664 部，“凡皆宛委琅函，嫻嬛寶簡，前人評跋，名家印記，確有可證，絕無翻雕贗刻，為坊肆書賈及好事家所偽託者”。“徧理珠囊，詳驗楮墨，旁稽互證，各有源流，而其規模析而彌精，恢而愈富。”

乾隆年間編的《天祿琳琅書目》，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書目，它實為清代官中所藏善本書志，它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最大的不同，就在於它是典型的注重版本著錄的“書目”。王先謙跋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云：“復命輯《後編》二十卷，書都一千六十三部，自宋迄明，五朝舊籍咸備，旁羅遠紹，既大極無外，而於槧印流傳之時地，鑑賞採擇之源流，並收藏家生平事略，圖記真偽，研討弗遺，尤細破無內。於版本嚴擇廣收，而明代影宋鈔本並從甄錄。”

實際上，“天祿琳琅”早已成為清代皇室典藏珍籍之代稱，畢竟是貴重圖書，其所藏每一冊書都鈐有多枚乾隆御璽，可視作皇家藏書之象徵。可以想象的是宮廷大內之門禁森嚴，也不是什麼臣工們都可直達之處。然而清末民初的戰亂和改朝換代導致清宮藏書不斷外流，至1925年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故宮物品時，原本664部的“天祿琳琅”後編藏書只剩下311部，留在宮內的這批書幾經輾轉，如今收藏在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。其餘353部中有176部見於記載，是被溥儀通過賞賜溥傑的方式流出皇宮。流失宮外的藏書，如今散藏在海內外六十個公私藏家，以國家圖書館和遼寧省圖書館所藏為最多，民間也有不少收藏。

“天祿琳琅”是內廷專藏，它的藏書歷來只有《天祿琳琅書目》、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可以瞭解，但“天祿琳琅”是個不容易做的冷題目，所以鮮有以此皇室專藏為題作研究者，井底之蛙如我，也僅知臺灣地區有《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》一書出版。然而，劉薈卻選擇了這個難題，四年前，她完成了《天祿琳琅研究》的寫作，而今又以四年之力，再接再厲，將力作《知見書錄》殺青，為“天祿琳琅”藏書作了一次全面的總結。

“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”，這句話用在版本目錄學的研究上，不僅在於對各種版本的介紹、版刻源流的考察，更在於揭示其內涵。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最為人所詬病之處，即其所著錄之書在版本鑑別上多有訛誤。而在圖書館工作的專家，責任之一即盡可能地揭示一書之版本，在編目過程中，最難認定的便是版本項。而此書詳盡介紹每書之卷端書名、題署、序跋、板框高寬、行款版式、刻工、牌記、諱字。至於原本裝幀之信息，則錄其書衣、書籤、函套等，以見清室書籍裝幀之特殊風格。我特別在意及欣賞的就是此書中版本考證的部分，正如劉薈在“凡例”中所云：“版本考證。節錄序跋中涉及書籍編纂、刊刻之文字，並目錄、書志及相關研究資料，每書約敘數行，略呈版刻崖略。對照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之記載，正其錯訛，補其無考，辨其真偽。特別揭示版本作偽痕跡，辨析闡明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致誤原因。”

我以為除了瞭解現今的“天祿琳琅”原書存於何處之外，更為重要的是要鑑定書之版本真偽。以《知見書錄》正編宋本之第二種《御題尚書詳解》十三卷為例，此書實為清康熙通志堂刻本。《知見書錄》此篇計2200字，除揭示基本概況外，又著重敘述了為什麼乾隆帝會將康熙時所刻之《通志堂經解》本誤認為是宋版並為之題詩之原因。再如《史記》一百三十卷，明嘉靖四至六年（1525—1527）王延詒刻本，此書在流傳過程中，書估

多有作偽，“天祿琳琅”所藏4部，皆以明充宋，手法拙劣，而劉薈目驗比勘，判定真偽，發人深思，讀者若細細品味，當可增益，津以爲此可作版本鑑定教材之例也。由此可見，辨偽之功夫大爲不易，這也遠非一般版本學家所能爲，因爲這是版本學及文獻學研究的實踐和深入。

如果說去寫“天祿琳琅”是目標，是毅力的表現，那版本鑑定之真偽則是劉薈業務能力和鑑定實力的展示，兩者不能缺一。顧師廷龍先生曾私下對我說過幾次，有些人雖然也稱爲版本鑑定專家，可是真要他去作實踐，卻是兩眼墨黑。爲“天祿琳琅”寫書錄者，劉薈是第一人。我相信，劉薈的責任是在進一步揭示原書的真實面目，故《知見書錄》提供給研究者之信息量頗大，以其每書存藏及版本審定來說，存者則有著錄甄別、鑑定後之版本，又全本錄其冊函數，殘本則註明存缺卷及冊數。現存之館藏地點及書號信息，藏於私人者，則註明藏家姓氏或堂號。即使見於各種拍賣之圖錄，也會記錄首次拍賣信息，以期留下蛛絲馬蹟。

劉薈將她的大作書名定作《知見書錄》，蓋知見者，有見識、見解意，也有看見、知道意。然此亦佛教用語，知爲意識，見爲眼識，意謂識別事理、判斷疑難。宋秦觀《法雲寺長老疏文》云：“無前後來去之際，有解脫知見之因。”清龔自珍《重輯〈六妙門〉序》又云：“不停心，則雖有無上知見，爲煩惱風動搖慧燈，若存若滅……制心一處，何事不辦，如開佛知見矣。”這樣的知見錄實際上也屬於書錄、書志、提要的範疇之中。在此之前，知見錄一類的參考用書很難有此境界及如此之水準。至於前些年出版的《古籍珍稀版本知見錄》、《日藏漢籍善本書錄》都是知見錄一類的參考用書，不過要寫好，卻是不易，蓋因知見錄有很大的局限性。即如前者龐雜無序，而後者所收之書雖有部分目驗，但有相當數量爲抄錄日本各種書目之著錄，以及轉抄日本學人記述，編著者本身沒有去作版本上的任何判斷，故難免出錯。所以同樣是知見錄，劉薈《知見書錄》是實事求是的著錄，它的重要就在於對版本實情的揭示較之原來的書目文字更爲得宜，若將《知見書錄》著錄的準確和詳細與上述二書相較，更顯得高下懸殊，天差地遠了，相去又豈能以道里計！

《知見書錄》的寫作實在不易，則在於劉薈的深層發掘，難就難在她目標既定，方向明確，即不遺餘力地去國內各地尋訪，這需要調閱眾多公藏單位及私人藏家所存“天祿琳琅”原書，而且還要申請、尋找經費上的支持，去臺北地區及海外圖書館訪書，這其中的難度可想而知。也因此，中國臺北、日本以及歐美東亞館、國內各館都留有她的訪書芳蹤。

“天祿琳琅”的研究雖然是個案，但我以為劉薈在研究這個課題中，不僅是費時費力，且寫作之難度，較之於清代館臣學士作《天祿琳琅書目》、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更為艱難。相繼完成的《天祿琳琅研究》、《知見書錄》兩部姊妹篇，真正是別具一格，獨闢蹊徑，憂憂獨造，自出機杼，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。她既繼承了清代乾隆、嘉慶時大學士們的先期成果，也開啟了以後學者作進一步研究的鎖鑰。

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劉薈是在1998年的冬天。那次我從波士頓飛去北京辦事，事畢見了幾位朋友，最後見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宋平生兄，其間，他說您要不要見見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劉薈。那時的劉薈雖然還是一個小姑娘，但她發表在刊物上的大作，卻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記得她是騎自行車趕來的，臉凍得通紅，但那次談了什麼，則記不起來了。

劉薈，曾是“哈佛燕京”的訪問學者，自從2006年8月1日開始參與寫作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》（清代部分），直至2007年7月止，她完成了二百多種善本書、三十萬字書志的寫作。工作充實，效率很高，所以她自我感覺很好，有一種成就感。因為如果在北京清華，那她必定是有各種“干擾”，也必定是無法完成這樣質量和數量的文字。劉薈自己也如是說。記得她在“哈佛燕京”時，曾跟我討論過她想寫的博士論文題目，說或者寫葉德輝，或者寫“天祿琳琅”。

在“哈佛燕京”寫善本書志，一天基本一篇，一千字至二千字不等。按照“哈佛書志模式”，版本項的認定及依據、作者的簡歷、各卷的內容、為何而寫，乃至於書的特點及鈐印、各館的收藏情況等等，能寫清楚的要儘量寫入。因為我們都認為21世紀的善本書志不能還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“老面孔”，總應該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層樓吧。一年後，劉薈返回國內，她給我的信中說：在哈佛的這一年，真是有很多所謂的進步，回到清華後，節奏慢了下來，覺得有一種失落感。她每天寫一千多字的書志，一個星期五個工作日，再去掉美國國慶日、感恩節、聖誕假期等，天天寫，兩百二十多天下來，寫了三十萬字。三十萬字對於在國內圖書館工作的人來說，諸事叢脞，做到不易。如今我初讀這本《知見書錄》，覺得似乎又看到了當年劉薈參與寫作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》時的模樣，她那瘦高健靚的身影，時常穿梭在書庫裏查書，或是坐在辦公室的電腦前，不停地敲着鍵盤，也難怪她每天都覺得充實，時有成就感。因為她有時運用別人想不到的材料，寫出了質量不一般的書志。看到逐漸加厚的書稿，也會想到不久的將來，那一個個的字符，一個個的標點，就會

變成一頁頁、厚厚的正規出版物。

我們提倡在圖書館工作涉及版本目錄學、文獻學領域的專業工作人員需要踏踏實實做事，認認真真研究，這個領域尤其需要基礎紮實、有研究實力的專家。可惜的是這方面的人才不是太多，出類拔萃者更為難得，至於女性則更是鳳毛麟角，最傑出者當推前輩冀淑英先生。劉薔長期在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工作，是這個領域中的佼佼者，我也期待於劉薔更上層樓，在古籍整理研究領域中做出更大成績。我願意為她點個讚。

劉薔是有“眼福”之人，她應該是百多年來，與“天祿琳琅”藏書最為有緣，也是見到“天祿琳琅”藏書最多的人，這是當仁不讓的。我對於“天祿琳琅”之書，歷年所見大約也只在十數部之譜，所以並沒有什麼研究心得，但是我很感謝劉薔對我的信任，囑我為她的大作寫序，故東拉西扯地寫上幾句，聊以塞責，不知劉薔以為然否。

2016年10月31日

寫於中山大學圖書館將要舉辦第三屆
版本目錄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前夜

嚴佐之序

劉薔女史新著《天祿琳琅知見書錄》(以下簡稱《知見書錄》)殺青在即,這是她“天祿琳琅”專題研究規劃中與前著《天祿琳琅研究》相輔相成的“姊妹篇”:已出版的《天祿琳琅研究》是對清宮“天祿琳琅”藏書及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的整體研究,將出版的《知見書錄》則為個案研究。個案研究是整體研究的文獻基礎,整體研究是個案研究的理論闡述,正如撰者所云:“兩者相合,堪為此專題之完整論述。”然而依我觀之,這兩部專著的關聯不僅在於“整體”與“局部”的分合,還在於兩種著述體裁的“古今合璧”:《天祿琳琅研究》分章為五,先後論述清宮“天祿琳琅”藏書始末,綜述藏書之現存狀況及版本實情,詳考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編纂始末,剖解《天祿琳琅書目》體例特點,歸納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版本學成就及考證得失,的屬現代學術論著之標準模式。《知見書錄》則沿襲清人莫友芝《郎亭知見傳本書目》以“知見”入目的特點,逐一考察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著錄各書的存佚及流傳,補其無考,正其錯訛,辨其真偽,考其存佚,臚列版本特徵,敘述遞藏授受,凡可援資考訂之文獻皆詳錄之,乃屬傳統書志體式之目錄專著。現代論著形式與傳統書目體式在某一專題研究中得以完美合璧,這樣的事例近來還不止一個,如郭立暄《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》的“通論編”與“實例編”,孫猛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》的“考證篇”與“研究篇”。若此個中之義,豈不大可玩味?這至少說明,在中國學術吸收西學、步入現代的今天,以古代書目為研究對象的古典目錄學,仍是一門“活在當下”的學問,歷史悠久且豐富多樣的傳統書目類型與體式,仍可在衆多研究領域中展示其“生命力”而大有作為。劉薔女史新著《知見書錄》,無疑為此“個中之義”增添了一個新的案例,樹立了一個新的典範。因為在我看來,作為一部具有專題研究性質的版本目錄,《知見書錄》既是對古代書目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的補正考辨,又體現了傳統“知見錄”的書目特點,並對傳統“藏書志”目錄體式的“推陳出新”“與時俱進”不無貢獻。

《知見書錄》著錄“天祿琳琅”舊藏善本古籍七百二十三部,凡現存者多經直接目驗,書佚或未知存處則遙錄文獻或注明綫索。因為這些版本

散落於海內外眾多公私藏家，而非庋藏一處，故而體現了傳統“知見錄”書目的性質特徵。撰者自稱“本書沿襲莫友芝《郎亭知見傳本書目》以‘知見’入目的特點”，是即謂此。然而，劉薈《知見書錄》之“知見”雖源自郎亭《書目》，其“沿襲”卻非亦步亦趨，而是從實際出發，有所變例。此所謂“實際”，就是劉《錄》之“知見”與莫《目》之“知見”並非完全一致。郎亭“知見”的對象，是以《四庫簡明目錄》著錄為基準的（少量《四庫全書》未著錄之書）傳世版本，而劉薈“知見”的對象，則是以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著錄為基準的（少量《後編》以外的“天祿琳琅”別藏）“天祿琳琅”舊藏善本。“傳世版本”當然會紛雜眾多，凡所知見之《四庫總目》著錄圖書的歷代版本皆可入目；而“舊藏版本”則是指定和唯一的，非原藏“天祿琳琅”者莫屬。因為要注記眾多“知見”版本，所以莫友芝《郎亭知見傳本書目》、邵懿辰《四庫簡明目錄標注》等“知見錄”倡始者，大都採用“簡目”體式著錄版本，後世繼之者大多如法炮製，鮮有踰越。唯近今杜澤遜先生《四庫存目標注》出，方始突破藩籬：在通常“知見錄”詳記版式行款之外，間或“於原書序跋，均記其年月姓名，并擷取與刊鈔有關者，以為鑑別佐證”；於“藏書家之題跋識語”之“罕見者”，則“逐錄之”；於“白紙初印、刊鏤精工者，特識之”，大大豐富了“知見錄”的版本信息含量。照理論分析的說法，就是在通常簡目體“知見錄”中，增入了“藏書志”的部分要素。而劉著《知見書錄》對通常簡目體“知見錄”的“突破”，則要比杜著《標注》更為徹底。當然，這是從實際出發不得不為的變例：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書目體式既已呈“藏書志”面目，那麼以“知見”《後編》著錄版本入目的《知見書錄》，又怎可繼續沿襲“知見錄”通常的簡目體式呢？且不論其書志撰寫如何，唯此一個“突破”，便從傳統“知見錄”書目體式“舊枝”上結出一個“新果”。至於說到書志內容，《知見書錄》的突出優異之處，就在考訂版本“藏棄源流”與“鑑別真偽”二端。而這正是揭示“天祿琳琅”舊藏原本真相最喫緊的要務：曾經庋藏清宮的珍善版本，當年如何流出禁城，其間怎樣輾轉各處，如今遺存幾許，散藏何方；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雖稱“重在鑑藏，不嫌博採”，惜其著錄版本訛誤頗多，當年館臣何以錯失至此，其版本真偽究竟如何。為此，《知見書錄》對“審定版本及存藏情況”的書寫可謂不惜“濃墨重彩”：“特別揭示版本作偽痕蹟，辨析闡明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致誤原因”；“過錄鑑賞家題識、題跋、題款、題詩”，“略考收藏家姓名字號與生平”；“嚴以《賞溥傑書畫目》，記其流出清宮時間，列出民國以來經眼、收藏及現今館藏書目著錄信息”，“備注出宮以後之遞藏授受源流”。較之以往“藏書

志”目錄，也不失為“別出心裁”。

作為“天祿琳琅”專題研究中的一個部分，賞讀《知見書錄》，會很容易想到余嘉錫先生的目錄學名著《四庫提要辨證》。這當然不是要拿現在的劉薈與已走入歷史的大師相比，而是因為這兩部目錄專著實在有着很多的相似性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和《天祿琳琅書目》（前後編）同為乾隆時代兩部最大的官修書目，被後世稱為“清代目錄學史上並峙的雙峰”。一部是旨在指導“讀書”的提要目錄，一部是重在指導“鑑賞”的書志目錄，二者“代表了古典目錄學的兩大流派”，都在古典目錄學史上居有重要地位，產生過重大影響。但同樣的遺憾是，這兩部官修書目也都因為種種原因而留下諸多闕失與訛誤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失誤，余先生在《〈四庫提要辨證〉序錄》中已道其詳，並以九十篇精彩辨證文章，彙為一書，樹立了“四庫全書總目”專題研究目錄的典範。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特別是《後編》的“版本鑑定錯誤及其原因”，薈女史在《天祿琳琅研究》中也有專節討論，繼而覆驗遺存舊本，撰成書志六百六十四篇，合為一書，為“天祿琳琅藏書”專題研究目錄的編撰開啟新河。由此設想，今之研讀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者，固已視余氏《辨證》為斷斷不可繞過的經典，後之研讀《天祿琳琅書目》者，是否也將無法繞過劉薈《知見書錄》呢？我的預見，自然是肯定的。

我獲識劉薈女史已十有餘年，其初的印象是特別聰明穎悟，久之則更感覺她的異常刻苦勤勉和認真細緻。既聰明穎悟，又刻苦勤勉、認真細緻，在學術事業上要不出大成就也難。所以能在不到十年時間裏，相繼完成《天祿琳琅研究》《知見書錄》兩部力作，她的成就之大，足以驕人傲世。幸運的是，這兩部大著我都獲睹在先。六年前，我忝席其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，見證了《天祿琳琅研究》問世的初啼。今復辱承厚愛，賜示新稿，並囑一言。受命展誦，獲益良多，感慨滋深。然自忖疏離目錄版本學研究前沿已有年月，知識漸趨老化，眼界難免囿限，於此書要旨精義，不足闡揚以萬一。惟念起潛先師嘗云：“目錄之有功於學術文化，蓋難以一二語盡之也。”遂敢抒鄙意，率記數語，聊為新著嚮引，且志觀成之喜云爾。

2016年10月記於滬上寓所

前 言

清乾隆九年(1744),高宗諭令內直諸臣,檢閱秘府藏書,擇其宋元明之精善者別於昭仁殿設架庋藏,御筆題爲“天祿琳琅”。乾隆四十年(1775),昭仁殿珍籍益富,文華殿大學士于敏中等奉敕編纂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》(前編)十卷,著錄善本 429 部。嘉慶二年(1797),乾清宮大火,殃及昭仁殿,前編書盡燬,乾隆帝令翰林院掌院學士彭元瑞等再輯宮中珍藏爲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二十卷,著錄善本 664 部。

“天祿琳琅”爲清代乾嘉時期皇家善本特藏,所收皆一流善本,嫻嬛秘笈,縹緗精品,素有“內府所貯圖書,具於天祿琳琅”之譽。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係中國第一部規範的官修善本目錄,沿襲漢代以來書目解題傳統,在編纂體例方面多有創見。作爲官修目錄,更是極具導向性,主導了其後二百餘年善本書目編纂風尚,至今海內外中文善本古籍之目錄、書志編撰仍深受其影響。這一組藏書與目錄,可互爲對應,是研究清代乾嘉時期版本學、目錄學成就的重要材料。考察天祿琳琅藏書的始末源流,需依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前、後編按日求書;客觀評價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的學術價值,亦必就存世原書探尋其版本實情,否則就《書目》談書目,又將偏信古人,失於盲從。然而此前從未有人做過存世天祿琳琅書的全面調查,其間詳情一直未見詳細蒐羅整理。

自 2008 年以來,筆者先後申請立項了兩項課題,^①專事天祿琳琅藏書與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之研究,對清宮天祿書存世狀況開展廣泛調查。調查過程是異常艱辛的,原因一是這批書如今星散世界各地,臺灣地區所藏

① 一是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 2008 年度古籍整理研究重點課題,“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研究”,課題編號 0814;一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課題 2009 年度資助課題,“海內外現存清宮天祿琳琅書的調查與研究”,課題編號 09BTQ016。兩項課題均已結項,社科基金課題結項等級爲優秀。

者超過半數，兩岸睽阻，往來不便；^①二是宋元版比例很大，無論公藏、私家，都視為一等善本，限於珍本保護原則，調取查閱極為不易；第三，眾所周知，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版本著錄多有訛誤，題為宋版，或許只是元版、明版，乃至清刻本，甚至抄本；而題為明版，實則宋版、元版，亦時有所見，版本內情頗為複雜，根本無法依靠《書目》所題版本按圖索驥，這也是限制其研究無法深入具體的重要原因；第四，從清末至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，天祿琳琅藏書由宮廷流入民間，飽經兵、水、火、蠹、盜諸厄，與國家共同經歷了最為動蕩紛爭的一段歷史時期。當年存放在一處宮殿裏的善本古籍，如今散落各方，很多都是身首異處，其間經歷大都輾轉曲折。有些書合二家、三家所藏，尚能拼為完璧；而有些則一部書分藏數家，最多可至十數家，各家均是殘帙，^②大大增加了覈對、比勘之功。

所幸的是，根據筆者的調查結果，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著錄書^③十存其九，絕大部分如今尚能訪見。664部書中，除宋刊本《公是先生七經小傳》、明刊本《鶴林玉露》2部確知已燬於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滬抗戰外，621部已知全書或部分卷帙現藏何處，6部有前人經眼或曾藏綫索，只有35部從未被人談及，至今仍不知下落，亦不知是否尚存天壤（以上統計截至2017年3月）。收藏最多者依次為“國立故宮博物院”（臺北）321部，中國國家圖書館277部，遼寧省圖書館35部，其他則散見於海內外六十

① 臺北“國立故宮博物院”現藏清宮“天祿琳琅”書三百餘部，是存世天祿書之最大一宗，不僅數量多，全本多，且保留宮廷裝幀原有形制，於清代版本學、目錄學及文獻學乃至宮廷賞鑑、裝幀藝術之研究皆有極高價值。2010至2013年間藉訪問交流、參加學術會議之機，筆者往來海峽兩岸，得觀臺灣地區藏書。2014年春天，又成功申請到香港北山堂專項資助，以“利榮森交流計劃訪問學人”身份出訪臺北故宮，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居於故宮院區山上，得以專心遍覽全部臺北故宮所藏天祿書原件，其中包括3部“國寶”級別、48部“重要文物”級別的宋元珍本。期間除再次目驗臺北“國家圖書館”、“中央研究院”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和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各書外，還看到了潘思源先生所藏6部天祿書及清內府寫本之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殘本一卷，圓滿完成臺灣地區的版本調查工作。

② 如明版類書《學海》二百三十卷，原書80冊，分藏在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、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、遼寧省圖書館、甘肅省會寧市圖書館、臺北“中央研究院”傅斯年圖書館、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博物院7家公藏單位和田濤、潘思源等5位私人手中，合12處公私藏家，尚不能拼為全帙。

③ 因每冊書之首葉版匡右上方都鈐有“天祿繼鑑”白文方印，又稱為“天祿繼鑑書”。

餘個公私藏家。

2008年夏天筆者屬意“天祿琳琅”研究之前，海內外尚無一部對此專題進行綜合性研究的專著出版，研究空白點甚多，並多有以訛傳訛之說，與乾嘉時期另一部清代官修書目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之研究盛況相比，反差頗大，其學術地位亟待深入研究。歷經4年時間，筆者完成基本調研，於2012年9月出版專著《天祿琳琅研究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456頁，46萬字）。拙著共分5章，首先論述清宮“天祿琳琅”藏書始末。理清這批善本特藏之來源、特徵、焚燬、重建、數量、典守、利用、維護、散佚等基本問題。其次，專章綜述天祿琳琅書的現存狀況及版本實情。根據實地調查，全面揭示天祿琳琅書存世狀況，並分地區、分藏家類型概述其收藏源流及特點，各計數量、版本品種。再次詳考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前後編之編纂，探討于敏中、彭元瑞等編纂者各自貢獻，《書目》中體現的乾隆帝的作用及版本學思想，見於記載的《天祿琳琅書目三編》、《四編》以及版本流傳情況。第四，剖解《天祿琳琅書目》體例特點，條分縷析其對當時及後世善本書目之影響。第五，歸納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的版本學成就及考證得失。拙著出版後，廣受學界好評，被認為是日前對此專題最為全面紮實之研究論著，^①並於2014年獲得第十三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。

在以上研究同時，筆者另有編撰《天祿琳琅知見書錄》計劃，即整理全部訪書觀書記錄，悉依宋、遼、金、元、明順次，逐一考察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著錄各書之存佚及流傳，用力於清代以來公私藏書目錄之爬梳整理，廣泛搜集前賢時彥成果，補其無考，正其錯訛，辨其真偽。其中已佚諸書，注其散佚年月，依據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及已出版之海內外公藏目錄，對真實版本略作推斷；尚存世間者則記其現藏何處，目驗群書，與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加以比勘，相互參照，逐條辨析，判明版本，詳記版本特徵，敘其遞藏授受，凡涉及版本或援為考訂之資者皆詳錄之。已出版之拙著可視為對於天祿琳琅藏書及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之整體研究，《天祿琳琅知見書錄》則為個案研究。兩者相合，堪為此專題之完整論述。

“重在鑑藏，不嫌博採”是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的收錄特點，“凡例”第四則

① 參見漆永祥著：《天祿琳琅流略盡，書林瓊葩別樣新——〈天祿琳琅研究〉讀後》，《書品》2013年第4期；柳向春著：《揭開“天祿琳琅”的神秘面紗》，《中華讀書報》2013年6月26日書評週刊版；楊果霖著：《〈天祿琳琅書目〉的整理成果及其展望》，《臺北大學中文學報》第19期，2016年3月。

云：“同一書而兩槧均工，同一刻而兩印各妙者，俱從竝收。”^①即同一書而兩刻皆工緻，從宋人尤袤《遂初堂書目》之例而並收；同一版而兩印皆精好，亦兩本並存。在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中一書多本、同書同本情況非常之多，同書異本情況，合計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前後編，總計 131 種書，552 部不同版本；而同書同版本者更多，據統計，《天祿琳琅書目前編》屬於一版多印者有 50 種 130 部複本，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有 76 種 184 部，拙著《天祿琳琅研究》第四章第一節對此有專門論述及統計。^② 因此僅憑書目信息，遇零卷零篇，或無藏印特徵，殊難判斷一書究竟著錄於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卷幾，必得綜考目驗各本，分合卷帙，才能準確判定。^③ 八年來，在同行同道的熱誠幫助下，筆者得以提閱包括很多公藏單位及私藏家手上的天祿琳琅書原件，目驗比勘，判明真偽。特別是 2014 年筆者獲準為香港北山堂基金會“利榮森交流計劃”訪問學人，在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進行訪書交流，以前後半年時間，繼續臺灣地區現藏天祿書之版本調查研究，並修正補充以往看書記錄。臺灣地區現藏天祿琳琅書總量占存世的一半以上，這部分工作的圓滿完成，使得全部研究更為具體而完整。

本書沿襲莫友芝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以“知見”入目的特點，最大限度地擴大收錄範圍，盡可能準確無誤地反映清宮天祿琳琅藏書現存情況，並記錄前人經眼錢索，藉以追尋佚書。作為版本書錄，以敘錄版本和遞藏為主。附錄二表 1《天祿繼鑑書存佚狀況、版本實情一覽表》可視為簡目，^④此《知見書錄》為其詳編。

版本調查過程中，還發現了若干部“天祿琳琅目外書”，^⑤依書上鈐印

①（清）于敏中、彭元瑞等撰，徐德明點校：《天祿琳琅書目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，“凡例”，第 10 頁。劉按，為引用方便，本書凡引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原文，出處皆指此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標點本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之頁碼。

② 劉薈著：《天祿琳琅研究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，第 288—323 頁。

③ 例如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收錄 8 部《唐文粹》，分別是卷七宋版集部二部、卷十一元版集部二部和卷十九明版集部 4 部，提要多云“同上，係一版摹印”，且多無私家藏印。雖云“宋版”、“元版”，實皆明代刻本，或為明嘉靖三年（1524）姑蘇徐煊刻本，或其明代覆刊本，非經目驗群書，難於判定所屬卷次。

④ 劉按，拙著《天祿琳琅研究》第二章表 2—2《天祿繼鑑書存佚狀況、版本實情一覽表》為截至 2012 年 3 月之統計，第 113—178 頁，《書錄》此表補充 2012 年之後新見存世天祿書，並對原一覽表進行修訂完善，截止時間為 2017 年 3 月底。

⑤ 詳見拙著《天祿琳琅研究》第三章第一節，第 187—199 頁。

標誌的不同，又可劃分為“前編目外書”、“後編目外書”與“三編書”、“四編書”。目外書的產生與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的持續、分次編纂有關，或因選餘，或因續入，或因撤出。^① 考察天祿琳琅著錄書之存世狀況，尚有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可作依循，而“目外書”的檢尋相比之下更為不易，目前所見，“前編目外書”19部，“後編目外書”20部，“三編書”18部，“四編書”2部。有鑑於此，將目前已知的各類“天祿琳琅目外書”作為附錄，附於正文之後，以資鑑賞。此外，判明一書所鈐天祿琳琅印記之真偽，可以幫助我們從容鑑定是否《天祿琳琅書目》著錄之書或目外之本，天祿璽印是我們確定一書是否清宮舊藏、是否與天祿琳琅有關等一切稽考之首要前提。特將訪書中所知見鈐有偽製“乾隆御覽之寶”、“天祿琳琅”等清宮藏印書情況，編為一覽，作為附錄，相關統計截至2017年3月。

此外，拙著《天祿琳琅研究》第三章“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的編纂”曾單設一節“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的版本與流傳”，記所調查經眼現藏中國大陸、中國臺灣、日本的《天祿琳琅書目》早期版本，包括不同的清宮寫本、名家批校本、抄本，計45種，以及載於前人目錄、藏書志、筆記中的傳本，總計有五六十種之多。此後訪書過程中，又不斷有所發現，此前未曾親見之書也終於提閱目驗，因此特將增補、完善後的“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的抄本及批校本”一節附於文末，既見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之流播，又可見其影響，以裨參考。

① 關於“撤出書”，參見曾紀剛著：《贗製還應重訂正——說乾隆朝天祿琳琅撤出書》，〈臺北〉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368期，2013年11月，第56—67頁。